

66 书香云南

我们都是星火的聆听者

王心昆

在这个依赖多媒体演示的信息时代，我们早已觉得传统演讲的语言艺术与我们疏远了。直到最近我读到《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》，才被这部纸上的讲堂所震撼，真切体会到演讲是一场严肃的公共精神仪式。

最新出版的《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》，是龙美光继《靛花巷三号：西南联大书信录》之后又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力作。该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，选录了西南联大40位知名学者在联大及北大、清华校园内的六十余次人文演讲。这些演讲从抗战与军事、教育与科学、文学与哲学、历史与经济、社会与文化、联大与三校等多个方面，凭借强烈的教育救国使命和深刻的科学思想，勾勒了一幅众声回响的西南联大声谱编年史。阅读此书，我沉浸在这国家至暗时刻的西南联大校外环境中，真切地感受到，我们内心深处向往的真正演讲，恰是一个在重要时刻将真理公开传递给众人的精神洗礼。这些演讲发自肺腑，饱含着人文温度，喷发着蓬勃的力量，迸发着文化发出了文化抗战的呼喊，发出了一代知识分子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时代呼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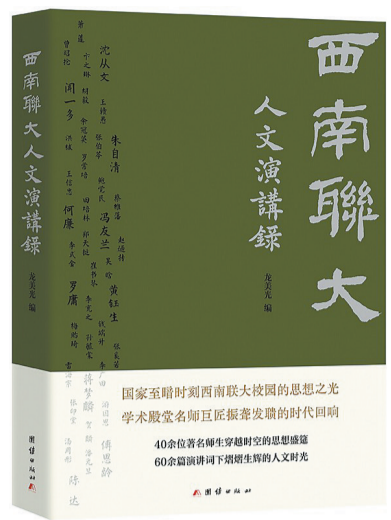
翻开《靛花巷三号：西南联大书信录》，阅读到的是联大师生曾经的私人书信，作为读者的我们，这时候都是时光的收信人。而阅读《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》，聆听到的是名师巨匠的公共发言，作为聆听者的我们，这时候都是星火的聆听者。如果说书信是联大时光的私语，那演讲则是联大时光的星火。正是当年有幸被聆听者记录下来，现在又被青年学者龙美光潜心收集整理，这一篇篇演讲词，透过历史的尘埃变得熠熠生辉，让我们有幸成为跨越时空的西南联大“旁听生”，聆听到抗战时期的众声回响。

若把《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》当作一部有声读物，我们便成了一群特殊的聆听者。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各种声音，探寻声波存在的时空范围，构建聆听名师巨匠演讲的三重声场。

聆听历史声场，那星火是烽火岁月里最灼热的宣言。翻开《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》开篇，让我们回到西南联大刚迁云南两个月多的抗战烽火历史声场，西南联大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傅恩

龄分别于1938年7月10日、14日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作了题为《暴日铁蹄下的平津》《现代日本之分析》的演讲。时空轮转，我居住在联大蒙自分校旁，每天都要路过曾经的蒙自分校旧址，联大师生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。我仿佛看到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身影，听到了傅恩龄教授面对广大师生及市民振臂高呼的声音：“我们要抗战到底，一直到敌人退出我们的国土！”“人人抱必死之决心，中国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！”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于1939年7月28日在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演讲《东京英日谈判与最近国际形势》，充满自信地大声疾呼：“我们不管有没有力量，应该假定自己有一种力量，能造成一种局面，左右国际形势，不使他人完全视我为弱国。应该使许多友邦知道，世界和平之有望，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”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于1945年7月29日在欢迎参加青年远征军同学返校大会上演讲时强调：“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，真正的力量在人民。人民一觉醒，一发动起来，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。”钱端升《美国与欧亚两大战》、崔书琴《欧战的趋势》、王信忠《七十年以来中日关系》、洪拔《越南与中国》、何康《抗战几年来的经济建设》、赵迺传《战后的复员问题》、王赣愚《战后中国自由主义》、冯友兰《战后中国的文化问题》、闻一多《战后文艺的道路》、张奚若《政治协商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》等演讲，都是西南联大教授在抗战时期的演讲，无不聚焦最紧迫的时代议题，展现知识分子“言在讲堂，声震山河”的使命与担当。

聆听思想声场，那星火是百家争鸣中最璀璨的交响。西南联大教授在抗战时期的坚守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最悲壮与光辉的篇章。他们守护火种，延续文脉，将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和最深邃的人文思考，通过精彩的演讲传授给战乱中的一代青年。这些泛着思想光辉的演讲，如同一部由多声部、多主题构成的复调史诗，映射出西南联大学术精神的众声交响。聆听罗庸《文学史与中国国文教学》、李广田《论文学的普及与提高》《谈报告文学》、沈从文《小说作者和读者》《短篇小说》、游国恩《楚辞女性中心说》、



下之琳《读诗与写诗》、冯至《《浮士德》里的魔》、朱自清《诗的语言》等演讲，对喜好文学的我来说，好比穿越到西南联大文学院做了一回“旁听生”，面对面听到了大师们的顶级讲座。吴晗在《农业与政治》演讲中，简明扼要地揭示出乡土中国的治理密码，揭示了地方性、季节性、家族性、传统性是农业社会的显著特征；重农、敬天、肥家、法祖则是几千年来政治史上最显著的特征。很多教授则将书桌搬至边疆大地，在李式金《青康自然区之划分及其对西藏历史》等演讲中，字里行间浸透着野外考察的风霜，将国家边陲的山川、民族、资源化为精准的学术认知，让学术成为认识国情、服务生存的必需工具。作为云南人，我尤其喜欢聆听教授们演讲与云南有关的课题，比如李亮之《云南的天气》、冯友兰《云南人与外省人》、张印堂《滇缅边问题》、曾昭抡《大小凉山考察记》等演讲内容，让我感受到不仅西南联大迁到了云南，联大教授也把云南装进了自己心里。而聆听汤用彤教授的《隋唐佛学之特点》演讲，仿佛看到在漫天烽火中，先生平静地回溯一场千年前的思想融合与创造，总结出隋唐佛学有统一性、国际性、自主性、系统性四种特性。聆听这样的大演讲，让我无比感动，真切感受到联大师生在战火纷飞中的

那份坚守与淡定。原来真正的学问，在破碎的天际间最为完美，在绝望的岁月里最有力量。正是这批西南联大的名师巨匠，在至暗时刻依然仰望星空，并能为我们这些后来者点燃星火，用演讲的声音，铸造不灭的灵魂。

聆听传承声场，那星火是文明深处从未磨灭的亮光。在抗战烽火中，西南联大的迁徙办学，昭示了教育是保存文明火种，为未来中国埋下复兴基石的壮举。西南联大常委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给我们作了《百年来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》演讲，西南联大常委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给我们作了《如何领导青年和做教师的责任》演讲，西南联大常委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给我们作了《从事教育者应有之新观念》演讲，这是对“大学何以存在”“文明何以传承”这一根本命题最深沉的回应，强调教育是塑造国民灵魂的根本途径。黄钰生《教育与宪法》《青年的道德问题》、曾昭抡《中国科学化运动》《抗战与联大》、冯友兰《关于“学生运动”》等演讲，共同构筑了一个信念：战争的胜利关乎国家躯体，而教育与科学的坚守，关乎民族灵魂能否在战火中不被焚毁，致力于重获新生。聆听罗庸《论读专书》、余冠英《坊间中学国文教材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》、罗常培《误读字的分析》、田培林《国社主义教育基本观念之检讨》、朱自清《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文学》《闻一多先生与新诗》等演讲，让我们体会到西南联大教授治学的严谨细致，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教育的尊崇，对教师的致敬。

最为动人的是罗庸、胡毅、蔡维藩分别介绍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的演讲，它们绝非简单的校史陈述，而是赓续三校优良传统，熔铸“刚毅坚卓”的西南联大校训，完成存续中国文化血脉的终极使命。聆听这些大师的演讲，让我们更为直接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大学，可以在任何物质废墟上屹立，只要其精神场域中，仍有师者以生命践行教育，仍有学者为文明守望星火。我们是星火的聆听者，只因《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》收录的，从来不是平静岁月中的闲谈，而是国家至暗时刻的思想之光。我们今日聆听历史的回响，正是为了确认自己是否仍在同一精神谱系之中，并愿成为民族星火的承接者和传递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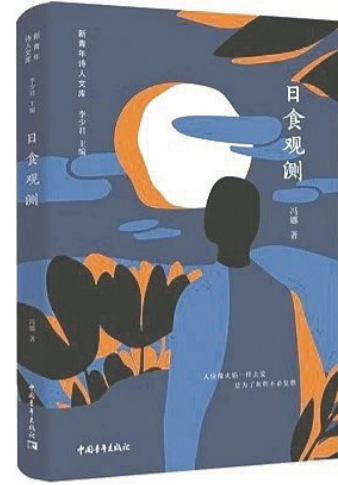
文艺新观

记忆、物我与原乡

——冯娜诗歌的抒情建构

唐诗棋

《日食观测》是冯娜近期出版的一本诗歌集，分为4个部分，共收录了120首诗歌。在“非个人化”理论与现代性反思的主流叙事下，冯娜的诗歌实践却呈现出一种独特且珍贵的抒情姿态，既区别于古典传统中直抒胸臆的率性表达，也未全然陷入现代主义的客观批判的情感疏离，而是在二者之间，开辟出一条既发生于个体生命体验、又通向普遍性感知的第三条路径。她将深度的生命感知和历史文化、地域民族的记忆转化为平静但有张力、克制却又深邃的文学表达，将情感转化成一种可被读取、感知和对话的存在，建构了一种与万物平等对话的抒情主体，凝练出高度具身化、去中心化的抒情风格。



记忆诗学：抒情的历史化与地方化

“记忆”是冯娜诗歌的关键词之一，她的抒情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的简单的情绪波动，而是扎根于历史文化与具身性实践的，声音与沉默交织的“记忆博物馆”，“通过”与历史对话，“与世界对话”及“与故乡对话”这三重维度的交织，冯娜将抒情主体锚定在广袤的时空坐标上，使其情感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与地理的坚实感。

她的新诗集《日食观测》第一辑“博物馆之旅”就收录了众多书写文物、历史和过往记忆的作品，例如“她在石头里获得时间，在别人的眼光和抚摸中获得生活”（《石像》），石像作为非生命体的生命历程；“但千年已卸在身后，我抖擞起他们有着的焦虑、无眠、游移不定，搀扶着老者，走向下一个石窟”（《与老者登龙门石窟》），写渺小个人面对浩瀚历史的细微感知。这无疑呈现出一种与“漫长的过去”进行深刻对话的能力，通过对历史的追忆和回望，极大地驰骋想象力，书写连接过去与此刻的抒情思考。静默的文物在她的笔下不是沉默的客体，而是在充满温暖的触摸下，流露出独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在残片与完整、沉默与言说、逝去与现存之间，在个人的渺小感怀与亘古时间的对视之中，成为通往另一重时空的密钥。

同时，她的抒情记忆还延伸到了广阔的地理空间，表现为一种具身的记游与哲思，她感知海的平和与汹涌，说“航行的夜间，命运颠簸而桀骜地起伏”（《夜航船》）；记录岛屿的日落日落，海浪流动蒸腾，写“沙流把我引向结晶，而不是休憩——阴影沉降，岛屿又一次沁出碱性的星星”（《赵速岛》）。这无疑延续了但国古典“登山临水”以感怀的传统，但其不再只是悲怀迷途，而是转换为现代知识分子对存在与世界关系的勘探，将饱满的情感用一种高自觉的、冷静的观察与凝练的语言所节制与重塑。

作为一个白族诗人，冯娜在云南丽江出生，来到广州求学、工作并生活定居，故乡成为她曾经深度感知，现今拉开距离的一道生命刻痕，既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与文化原点，也成为一个个正在被也将持续被追忆与重构的精神意象。所谓“远行之人总有故事”，她与故乡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，在他乡写故乡的宿命之中，呈现出诗性抒情的独特张力。海德格尔曾言：“诗人的天职是返乡，惟通过返乡，故乡才作为这手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。”在《日食观测》最后一辑的第一篇即是《出生地》，“人们总向我提起我的出生地，一个高寒的、山茶花和松树一样的藏区”，她在诗作中通过独特的矛盾张力来分享特殊的地域民族文化、生命思维，“他们教会我一些技艺，是为了让我终生不去使用它；我离开他们，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；他们还说，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，是为了灰烬不必复燃”（《出生地》）。这是几组看似对立，实则真实的代际经验传递。空间与时间的距离使得故乡在记忆中愈发地纯粹与清晰，这些温暖细节通过诗化的抒情重构了诗人的“原乡”。

物我同一：抒情的关系维度与对话姿态

如果说冯娜的“记忆诗学”为其抒情奠定了深广的时空基础，那么她所秉持并实践的“物我同一”的伦理，则从根本上重塑了抒情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，并决定了其情感特有的流淌方式与最终形态。

冯娜的对话伦理鲜明地体现在其对自然万物的书写中。她自觉地舍弃了人类中心的叙事视角，代之以一种“去中心化”的移情与想象。在她笔下，一株植物、一只动物，皆非被观照的客体，而是拥有自身生命逻辑与感知世界的独立主体。她不描写鼯鼠的外貌，而是站在它的视角，发出“一定会有一

个属于我的洞穴”（《鼯鼠》）的感叹；她不叙述橙子的口感，而是俏皮地讲“我舍不得切开你美丽的心痛”（《橙子》）的玩笑话语；她不观摩树的形式，而是赋予它以主体性的知觉与渴望，写“白桦们齐齐望着，那些使不好猜论的人们”（《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》）。她用自然的眼睛反观人类世界，展现出天真俏皮、纯粹可爱的抒情风格，这不仅仅只是一种视角的转换、拟人的修辞，而是一种平等宽容视角下，对“他者”存在自主性与完整性的尊重。通过这种“成为他者”的想象性超越，冯娜消解了抒情主体“我”的中心性，情感不再是人类情绪的独白，而是在跨越物种界限的共感中生成的、更为广阔的生命共鸣。这使得她的自然抒情脱离了田园牧歌式的感伤或象征主义的工笔化，获得了生态诗学意义上的深邃与诚恳。

因此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，冯娜诗歌中的抒情是一种“经由对话而抵达的共情”。通过将自我“物化”或将万物“主体化”，她拆解了封闭的自我，建构了一个开放、交感的意义生成场域，树立起一种独特而动人的抒情范式。

边缘感知：抒情的身份视角与风格特征

尽管冯娜自称“我不是藏人，我是一个诗人”（《雪的意志》），但无论分析其内容结构，还是评议其诗歌特征，我们都无法绕开她所承载的“民族”“女性”“诗人”这三重身份。冯娜成长于汉文化主流语境与云南边疆本土文化的交界地带，这种“边缘”位置，赋予她一种天然的文化翻译者视角。她曾在《汉语中还乡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我，不过是汉语，一次又一次还乡。”在内容上，不仅体现在前文提到的她对故乡的一次次书写与回望，更可以从“火塘、铁器、草药、织物、酿酒、禽鸟、根茎植物”这些频繁出现的日常事物中窥见一二，这些并不宏大的意象，为诗作染上民间智慧与自然精神交融的色彩，这些云南的声响，共同铺就、织成了这片充满了诗意的土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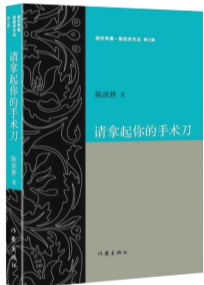
同时，女性的身份，赋予其感知以独特的细腻度、内向性与生命关怀。冯娜的诗歌常常从细微处切入，展现出对情感纹理与身体经验的惊人捕捉力。“一个来自中国南方海岸的女人，脱下雪纺衬衣和三十岁的想象力（第一次，触摸到了那带着颤声的棉花”（《棉花》），她能将亲密关系的复杂感受，凝练为“感知棉花”般具体的而微妙的触觉意象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书写并未止步于私密情感的咏叹，她清醒地凝视女性在生理与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处境：“空间足够，带回床上的颤抖，那无畏的清醒，在后来，像脏兮兮的地砖，被长年累月浸泡”（《泳池更衣室中的女人》），本诗中对生育经验的复杂描述、对家庭内部无声力量的呈现，均透露出她对女性生命经验的深刻体察与内在书写。这种视角，使得她的抒情在温柔中蕴含着力量，在个人经验中映射出普遍性的生存境遇。

如果说“民族”身份带来的是文化位置上的边缘性与万物平等的世界观；“女性”身份贡献了感知方式上的细腻性与经验维度上的内向性，那么这两个维度与感知都在“诗人”的自觉性中进行了独特的美学蒸馏与萃取，使得冯娜能够自然地采用一种去中心化的、多声部的视角进行观察与抒情，用温柔对话的伦理姿态，使其超越个人经验的局限，抵达普遍的共鸣。

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
云南日报文艺教科中心
合办
邮箱：ynwypj@126.com

新书架

《请拿起你的手术刀》出版发行



作家、批评家陈歌耕的文学评论集《请拿起你的手术刀》，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该书包括“拖把”和“抹布”两辑，收录了陈歌耕围绕当代文坛、文学创作、文艺批评等领域的多篇深度评论文章。这些文章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批判锐度，既梳理文学现象、辨析作品价值，也直面文坛问题、反思批评生态，展现出对文学本质与时代精神的深刻思考。

陈歌耕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上海大学非虚构写作名师工作室主持人、客座教授。著有中篇小说集《孤岛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青春驿站》，长篇小说《点击未来战争》《废墟上的觉醒》，文化批评随笔集《快活集》等十多部作品。多年来致力于文史非虚构写作，已出版历史非虚构作品《剑魂箫韵：龚自珍传》《蔡京沉浮》《榭下先生》等。

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出版发行



批评家傅逸尘的最新研究专著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该书从文学的角度提出新时代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概念，并对近年来蓬勃兴起的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小说思潮进行详细论述，展开建构“新红色经典”的文学想象。

云岭阅读

抗战叙事的另类书写

宋家宏

昭通作家吕翼近期发表了两篇小说《送行》和《擗拐》，两篇作品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书写云南乌蒙山区普通民众投身抗战的故事。小说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《送行》在《飞天》2026年第1期发表后，迅即被《作品与争鸣》2026年第2期和《小说月报》2026年第3期转载，并在江西省文化馆主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。

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，云南有着特殊的地位，既是前方又是后方。前方主要在滇西，不仅有“腾冲保卫战”等战场厮杀的悲壮，还有滇缅公路、驼峰航线抗战生命线上的英勇。对滇西前方抗战的关注曾一度有所忽略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作为正面战场的滇西抗战，受到高度关注，各种文艺作品创作繁荣，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。以云南昭通为核心的乌蒙山区一带，是典型的抗战后方。在全民抗战的历史进程中，后方人民也做出了重要贡献，仅台儿庄一役，云南昭通籍子弟兵有明确记载的牺牲人数就达3398人。昭通也曾遭受过日本飞机的轰炸，在修建云南许多机场的过程中，尤其是滇缅公路的修建，昭通人民也付出了鲜血与生命。迄今为止，后方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贡献，书写却很不充分。

作家吕翼这些年一直重视抗战题材的书写，影响较大的《马嘶》等作品就属此类。作为现实主义作家，要写好战争题材，自有其难度。直接书写战场上的厮杀，除亲历者外，作家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与采访，甚至重返战场采访，这是写好这类作品必须做的功课，否则只会编造出一些“神剧”。吕翼写抗战题材，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直接书写后方人民在抗战中的真实生活与情感。他避开了正面战场的硝烟与厮杀，将镜头对准云南山区普通民众的后方生活。《送行》和《擗拐》这两篇作品均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，以抒情写“亲情离别”为主题，完成了后方人民的家国叙事。《送行》写彝族农民罗木拖夫妇这两个儿子和战马赤焰参军赴台儿庄；《擗拐》写铁匠擗拐师傅支持徒弟狗剩及两个儿子从军抗战。两篇小说都将“小家”的离别之痛融入“大家”的救亡图存之中。这种“后方叙事”的另类选择，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叙事策略的自觉——它不追求战争的戏剧性冲突，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，

在器物制作与情感积淀的缓慢过程中，呈现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的精神状态。

吕翼已有多年的创作实践，这让他深刻地理解到细节描写是一篇小说成功的关键。他又是昭通成长起来的作家，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故土。他熟悉自己家乡的生活，尽管时代在变迁，但一些生活细节并没有改变，尤其是那些代表着一个民族、一个区域特色的生活细节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这两篇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就是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描写。

《送行》中，远秀为两个儿子赶制布鞋的过程，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。它没有显得冗余的细节铺陈，而是一种“慢叙事”的美学选择。在慢叙事的进程中，承载着浓重的亲情，承载着两个儿子要上战场、母亲难舍难分的厚爱，作者详细记录了做鞋的每一步工序：制尊麻、搓麻线、搓麻芋草、抹糨糊、纳鞋底、绣鞋面……这些手工技艺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消逝，可贵的是，作家吕翼在这种工序还未消失时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、亲历过母亲以此承载的厚爱。因此，这些细节书写了日常生活的肌理，在小说文本中获得了档案般的精确性记录，又与“家国情怀”融为一体。任何情感都必然伴随着记忆，远秀做鞋时不断回忆记：从土豹子口中抢回阿力、用银簪子挑破阿木的水疱、儿子们抢着帮爹舂米……这些插叙不是打断小说的叙事主线，《送行》写的是“项链”。吕翼在这篇小说中也力图写好小说中各自的器物。《送行》写的是“鞋”，《擗拐》则是“刀”。铁匠擗拐师傅为徒弟狗剩锻造战刀的过程，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主线。这把刀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材质——滇缅公路的铁轨头。这一选择极具象征意味：它承担着抗战前方重任，来到后方还要上前线，经锤头重击砍杀寇敌。它是连接后方与前方的“器物”，它要经历被截断、锻打、淬火成刀，完成从“后方人”到“前方战士”的功

能转换，它隐喻着云南人民整体上在抗战中所肩负的历史重任。作者以专业性的笔触描绘了制刀的全过程：选料、生火、锻打、淬火、开刃。每一环节都蕴含着人生哲理：“锻打要顺着铁巴的纹路走，为人处世，得顺着性子走”“这时候叫‘亮黄’，最好……再高就成‘白火’，钢就脆了，没韧性。做人也一样，太急了，脆，容易折”，这种“以技喻道”的写法，赋予器物制作以伦理教育的功能。“刀”不仅是杀敌的武器，更是人格的隐喻。

现实主义小说重在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，什么是昭通人的性格？这些年“昭通作家群”的一些作品已经比较深入地描写了“昭通人”，部分作品已经对昭通人性格的群体特征有了较好的刻画。比如昭通人的“擗”，一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对它有了不同的描写。“擗”这个词，在民间口语中常用它来说昭通人，往往带有贬义，其实这是中性的词，它的基本含义是执拗、不服输、桀骜不驯。在不同的场合，它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。吕翼两篇小说中的一篇，直接用《擗拐》来命名。《送行》中罗木拖的“擗”，是对马儿赤焰如家人还胜于家人的呵护。马儿赤焰与儿子同时受伤，他不去管儿子，却忙着去照顾马儿，这“擗”不近人情，最后把这匹马连同两个儿子一起送上了战场，赤焰既是战马，也是家庭成员，它救出了最好的刀，连同他心爱的徒弟一起送上前线。昭通人的“擗”，在抗战时期体现出伟大的抗战精神：国难当头，忍辱不拔，前仆后继，为了抗战胜利，不惜牺牲一切！

吕翼这两篇小说对全民抗战的“后方”作了另类的书写，真实地描写了抗战中后方人民的伟大贡献，将抗日战争这一宏大主题转化为具体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。既保留了民间叙事的质朴与韧性，又是对历史的回望，也是对乌蒙山人“擗”的群体性格升华为抗战精神的礼赞。